

中国正史 《高句丽传》

详注及研究

刘子敏 苗威 著



香港亚洲出版社

延边大学 211 工程建设项目

中国正史《高句丽传》 详注及研究

刘子敏 苗 威 著



香港亞洲出版社

责任编辑:明 亮

印制工艺:忠 瑞

封面设计:盛 男

书 名: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及研究

著 者:刘子敏 苗 威

出版发行:香港亚洲出版社

地 址:香港葵涌大连排道 144 - 150 号

金丰工业大厦第一期 16 楼 F 座

制版印刷:香港亚洲出版社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309 千字

初 版:2006 年 9 月

印 数:1 - 1000 册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 - 492 - 213 - 6
978 - 962 - 492 - 213 - 4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港币)

前 言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古代民族，该族所建立的高句丽国，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七百余年，它曾经占据过玄菟、辽东、乐浪、带方四个边郡的广大土地，在其鼎盛时期，其疆域跨越汉江，到达了朝鲜半岛的南部地区，因此，与韩国的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中、朝史书对于高句丽历史皆有记载，而记载最早、最系统、最可信的，还是中国正史中的高句丽诸传。

最早记载高句丽史事的是《汉书》，这是我国正史中第一部断代纪传体史书，虽然《汉书》并没有为高句丽立传，但是，高句丽初期历史的一些重要信息却记载于其中，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在《昭帝纪》中记有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之事，《天文志》也有筑城的记载，证明第二玄菟郡应始于昭帝在位之时，而高句丽纳入该郡管辖，自然也是在这个时期。《地理志》则记载了玄菟郡的三个属县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高句丽县的地理位置的记载，使我们得知高句丽分布区的大致方位。更为重要的是《王莽传》的相关记事，使我们得知高句丽与中原及东北郡县的关系以及国王驁（即邹牟或朱蒙）的相关信息，并从中窥知第二玄菟郡瓦解的原因以及高句丽崛起的社会背景。毫无疑问，高句丽建国伊始就是在玄菟郡的管辖之下，其国王驁曾被西汉皇帝封为“王”。

最早为高句丽立传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成书晚于《三国志》一百余年的《后汉书》也采纳了陈寿的体例，将《高句丽传》置于《东夷传》之中，并同样采取了通史的手法，将《汉书》的高

句丽记事纳入其内。陈寿和范曄所撰《高句丽传》，皆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横向叙述，记载了该古族古国的地理位置，国都所在，疆域的面积及居民的户数，自然环境，饮食居处，祭祀信奉，性情喜好，官爵等级，与邻族夫馥之异同，五部名称以及权力转移的情况，玄菟郡高句丽县对高句丽部落的管理以及高句丽的阶级差异、民间习俗、经济状况、礼仪、服饰、法律、婚俗、葬俗，以及其势力的扩张、与旁系部落的关系等。颇为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为我们提供了“古高句丽”（亦即建国前的高句丽）的某些信息，使高句丽史的上限明确地提到了汉昭帝建第二玄菟郡之前。二史《高句丽传》第二部分即高句丽的编年史，以时间为顺序，记载了自王莽朝而至本朝的历史，重点记述与中原朝廷及东北边郡的政治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高句丽发展的明晰脉络。

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后汉书》、《三国志》的《东夷传》是“中国传”还是“外国传”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东夷传》所记古族古国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问题，其中自然要涉及到高句丽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如何看待“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外国（如朝鲜）”的问题。

近来韩国有人对《三国志》中的《乌丸鲜卑传》与《东夷传》发表见解，认为陈寿为其中所记各族立传，是将这些古族“看成是不属于三国史（魏、蜀、吴）的其他民族的历史来记述的”，这就意味着将《东夷传》视为“外国传”了。另外，他还以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中称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国”为据，认为“此三国是与中国不同的外国”。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及高句丽的“千里长城”为例，说明“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把万里长城以南看作自己的领域”，而高句丽的千里长城“是作为国家（高句丽）与国家（唐朝）的疆界修建的”。（崔光植：《“东北工程”的背景和内容及对应方案——以高句丽史研究动向和问题为中心》，韩国《中国歪曲高句丽史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些说法并不新鲜。

我国学者张璇如先生就在《国外学者有关我国东北疆域、民族种种错误观点》（《黑土地的古代文明》）一文中，列举了诸如“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中国在边境无主权论”、“征服王朝论”、“文化主权论”、“国史中心论（‘血亲论’）”、“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史观”等错误乃至反动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一些帝国主义的御用史学家和极端民族主义学者将我国北方民族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异民族”，主张北方“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长城以外不是中国领土”等等。这些主张和言论的核心的也是本质的问题即是否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的客观存在，韩国学者视《东夷传》为“外国传”即是出于上述认识的具体表现。

首先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史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应当明白，古代史家的史学观是与中国古人的“天下观”有密切关系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唯物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人们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常常是以“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中国古代的“中原中心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由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因此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国古代史就是如此发展的，因此史家在书写历史时，“详内略外”是自然之理，而这“外”并非指什么外国，“内”即指“中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由“内”和“外”统一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原皇帝的眼里，并没有什么外国。日月所照，舟车所通，皆为天子的臣民。史书中所出现的“中国”，从广义上说即泛指中原或指郡县统治区，亦即“内”，周边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居住区，或非郡县统治区，故而称“外”。古书所载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原的华夏之族或说汉族，都是属于古代中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史家撰史，就是按照这样的史学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的。从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开始，所撰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都不是“外国传”，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是汉朝历史的组成部分。至于《三国志·

东夷传》，分明是《魏书》中的组成部分，东夷各国的历史，亦皆为曹魏的一部分，在当时曹魏天子的眼中，东夷各国皆非“外国”，《东夷传》自然不是什么“外国传”。

《东夷传》中的“三韩”与倭国，彼时皆未纳入中原朝廷的郡县之中，同时，后来的“三韩”皆为百济、新罗所并，倭国后来脱离了中国的册封体制。新罗与百济亦仅是中国的属国，而不是中国的割据政权。至于东沃沮、秽（东秽），因曾纳入中国的郡县统治，自然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其居地为中国之版图，这是没错的。高句丽的性质，为中国的边疆地方割据政权，自然是归属中国。如果将《东夷传》看成是“朝鲜传”，乃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因为彼时并没有“朝鲜”这一国家。“朝鲜国”的诞生是后来的事。

据韩国的《朝鲜日报》2004年1月7日文娱版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国学世宗大王名誉客座教授伽里·莱德亚德在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对高句丽领土与韩国的关系发表看法，认为《三国史记》记载的“三国”并无“统一”这一概念，而只有“合并”一词，当时不存在“韩国”的国家和领土。这种说法还是附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长城是否国界的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战国时期所修筑的长城，基本就是各诸侯国之间的“国界”或某诸侯国与某些少数民族的分界，但大多数则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塞内是汉族，塞外是少数民族。就东北地区的燕汉长城来说，也是如此。夫余、高句丽都曾是塞外之族，但中国的郡县却有设于塞外者（如玄菟郡），怎能说长城是“国界”？至于高句丽所修之千里长城，可以说是这一割据政权疆域的西界，但由于这一割据政权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自然这长城就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界线了。强调诸如高句丽是“独立国”的学者，大多只是从“民族共同体”上作文章，而对“国家共同体”则常常采取回避的做法。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同其他民族共同体相比，皆有其“独立性”，高句丽就是一个有别于秽、貊、夫余、汉等民族的“独立”民族，但这一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各族却皆包括在一个国家共同体“中

国”之中。

《东夷传》的设置，尤其是《高句丽传》的设置，是陈寿的一大贡献，继其后，直到两《唐书》，皆为高句丽立传，将其纳入东北边疆史之中，为研究我国东北边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我国正史中的《高句丽传》乃至《百济传》、《新罗传》，为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三国史记》提供了充足的史料，金富轼在撰写该书时，凡是涉及到“三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中国正史中的“三国传”，其中的《高句丽本纪》中的相关史料，自然是取材于中国正史中的《高句丽传》。

《三国史记》成书于公元1145年，即我国南宋绍兴十五年、王氏高丽仁宗十三年，距高句丽灭亡已近480年。金富轼所取史料，除了采取中国正史及其他史书中的记载外，当有王氏高丽流传下来的有关高句丽的史料，尽管这些史料由于流传时间的久远而许多记载已经失真，但有些史料还是颇为可信，并且十分珍贵的，它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相关记载的不足。例如，关于高句丽族的形成时间、建国情况及五部的形成过程，若不看《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则无从知其详。据其《高句丽本纪》载，于朱蒙建国前在今浑江支流富尔江流域就已经存在一个以“沸流国”为盟主的部落联盟，所谓“荇人国”、“黄龙国”即是联盟中的成员。参照《后汉书》、《三国志》关于高句丽县令主管高句丽族及赐予鼓吹技人等记载，就可以窥见“古高句丽”之一斑，从而得出高句丽族至少于汉昭帝在位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结论；若根据金富轼关于卒本夫馥、梁貊的记载，并参照中国史书中关于在高句丽县的东界筑“幘沟娄”的记载，便可复原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的大致范围和民族结构。学界对五部形成的时间及各部的方位、领域皆有不同看法，但如果根据《三国史记》所提供的资料分析，五部的形成应在高句丽征服诸如盖马国、句茶国、藻那、朱那，第二玄菟郡瓦解，高句丽稳定地在“国内地区”建立其根据地之后，即太祖王时期。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三国史记》所取高句丽流传下来的

资料错杂混乱的情况，以及金富弼在采纳中国文献相关记载所出现的“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情况。关于后者，可以金富弼篡改《汉书·王莽传》高句丽记事为例来加以证明。只要在微观上将班固的记载和金富弼的叙事加以对照比较即可发现，金富弼将本不是同年发生的事情，放在同一年的记事之中，用高句丽流传下来的错误说法“修正”了《汉书》的正确记载。有些人正是由于过分地相信《三国史记》的记载，不加分析地肯定金富弼的说法，甚至进行了不符合实际的理解。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应当占有充足的史料，而史料的来源基本包括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口耳相传三种情况。其中，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固然是可靠的，但是毕竟有限，而学者们大量使用的还是文献学所提供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文献记载并不完全可靠，误传误记者有之，脱衍错简者有之，甚至伪造历史者亦有之。考察历史或撰写历史，第一道工序就是收集资料，第二道工序就是整理资料，第三道工序就是辨别史料的真伪及可信程度，最后才进入对其课题进行整体研究或撰写史书的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撰写史书还是进行专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第三道工序。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前，首先写了《资治通鉴考异》。现在看来，《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错误那么多，这和金富弼未能对相关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辨有直接关系。

《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及研究》原本是我们二人在给硕士研究生授课时编写的讲义，故而带有“文章宣讲”的特点，重点在“导读”或疏通文字方面。但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来说，自然应该进一步提高学术含量，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因此，在“文献辨析”和“问题研究”上又颇费了些功夫，加入了许多深入研究的内容，以便作到雅俗共赏，在普及中有所提高。

作 者

2006年6月16日

目 录

前言	1
一、范晔：《后汉书·高句骊传》	1
问题研究	20
1. 高句丽的族称	20
2. 高句丽族的族源	21
3. 高句丽为何称貊人或秽貊	22
4. 高句丽第一次迁都	23
二、陈寿：《三国志·高句丽传》	26
问题研究	39
1. 高句丽五部的形成及地域	39
2. “国内”考释	40
3. 玄菟郡考	42
4. 关于高句丽王系的考证	47
5. 关于毌丘俭征讨高句丽之役	49
6. 高句丽同东吴的交往	50
三、沈约：《宋书·高骊传》	52
问题研究	59
1. 东川王所筑平壤城考	59
2. “渭水”考辨	63
3. 高句丽前期的社会形态	65
4. 高句丽前期的官爵制度	69
四、萧子显：《南齐书·高丽传》	77
问题研究	82
1. 高句丽后期的社会形态	82

2. 高句丽后期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	84
3. 高句丽后期的官爵及其演变	95
五、姚思廉：《梁书·高句丽传》	103
问题研究	109
1. 关于橐离国的位置	109
2. 高句丽的阶级构成	110
六、魏收：《魏书·高句丽传》	114
问题研究	133
1. 关于朱蒙诞生神话	133
2. 关于朱蒙建国传说	134
3. 高句丽前五代王世系考（之一）	137
4. 高句丽前五代王世系考（之二）	138
5. 高句丽与北魏的交往	139
七、令狐德棻：《周书·高丽传》	142
问题研究	150
1. 高句丽人的饮食	150
2. 高句丽人的服饰	151
3. 高句丽人的住房	151
4. 高句丽人的出行	153
八、魏征等：《隋书·高丽传》	155
问题研究	163
1. 高句丽的婚俗	163
2. 高句丽的葬俗	164
3. 高句丽的祭祀	165
4. 高句丽的祥异观	170
5. 高句丽的灾异观	170
九、李延寿：《南史·高句丽传》	172
问题研究	175
1. 高句丽的汉字	175
2. 高句丽使用汉语	177

3. 高句丽的文学作品	182
4. 高句丽的哲学思想	184
5. 高句丽的汉籍	187
6. 高句丽的教育	187
7. 高句丽的体育	188
8. 高句丽的美术	189
9. 高句丽的音乐	191
10. 高句丽的舞蹈	192
11. 高句丽的自然科学	193
十、李延寿:《北史·高句丽传》	194
问题研究	214
1. 高句丽的佛教	214
2. 高句丽的道教	216
十一、张昭远等:《旧唐书·高丽传》	219
问题研究	253
1. 高句丽同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的关系	253
2. 高句丽同百济的关系	255
3. 高句丽同新罗的关系	256
4. 高句丽同倭国的关系	258
十二、欧阳修等:《新唐书·高丽传》	261
问题研究	295
1. 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自我意识”及其他	295
2. 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	307
3. 中华天下秩序中的高句丽	312
4. 高句丽灭亡的原因	335
5. 高句丽在古代中朝关系史中的地位	342
说明	346
后记	347

一、范晔：《后汉书·高句骊传》

（一）作者简介

范晔（398—445年），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县）人。出身官僚家庭。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成年以后步入官场，曾担任过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因触怒刘义康而被贬为宣城太守。由于官场不得志，便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博采诸家有关后汉之书而为一家之著作。后来官职又有几次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末，因孔熙先等谋立刘义康为帝一案的牵涉，被宋文帝处死，时年48岁。《后汉书》虽题名范晔撰，但实际上，范氏只写了纪和传；南朝梁时，刘昭将晋代司马彪所撰《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在范书之后，以填补范书无志的缺陷。但起初这两部分是各自单行的，至北宋时将范氏的纪、传，与司马氏的八志重新校勘，才开始合为一书。

（二）本文提示

本文选自《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也称九夷，是我国古代华夏族对东方诸族的泛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所指并不相同，到周代时，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夷人已多融入华夏之中，有少数迁往他地，其中迁往东北地区者，亦已与当地土著民族相融合。《后汉

书》所立东夷诸传，皆为东北夷，即东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而高句丽则为东北夷之一。本文所记载的内容，实际是包括了西汉时期高句丽历史，并不仅仅局限于东汉时期。它既有高句丽建国前的“古高句丽”的史料，也有高句丽建国后的史料。本文除了简述高句丽的地理位置、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官爵设置、宗教信仰、穿着服饰、法律状况、婚姻丧葬外，重点依年代的顺序记述了自新莽时期而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间的高句丽历史，期间在位的高句丽王当有东明王、琉璃明王、大武神王、闵中王、慕本王、太祖王、次大王、新大王等。《后汉书》的成书年代比《三国志》晚，但所记内容对《三国志·高句丽传》有所补充，实为研究东汉时期高句丽历史的最为权威的重要史料，因而倍受中外学者的重视。

（三）原文与注释

原文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

注释

【高句驪】此指高句丽国。驪，有的史书写作丽。

【辽东】此指汉辽东郡的治所襄平，故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旧城区。

【朝鲜】此指古朝鲜旧地，即汉武帝所置乐浪郡地区，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古朝鲜的北界为今清川江一线。高句丽在东汉时，其南界已达到清川江中上游的北岸。

【濊貊】此指东濊，简称濊。《后汉书·濊传》：“濊北与高句

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其地即为汉武帝所置临屯郡的领域，相当于现在朝鲜的江原道地区。东濊是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由东迁的秽人（夫余的前身）同该地的土著人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

【沃沮】古代族名、地名，在出土文物及其他史书中亦写作天沮、夫租。沃沮有北沃沮、东沃沮（也称南沃沮）之分，二者的界线大致是今朝鲜咸镜南道与咸镜北道之间的摩天岭。“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狼林山脉）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婁、夫馀，南与濊貉接。”此实际已将北沃沮包括进去了。而北沃沮之地相当于今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东部地区、朝鲜的咸镜北道、俄国的滨海地区，考古界所说的“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即是北沃沮文化。《山海经·海内经》所载之“天毒”即后来的沃沮。参见刘子敏：《〈山海经〉“天毒”考》，《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

【夫馀】古代族名、国名。夫馀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燕）北邻乌桓、夫馀。”《后汉书·夫馀传》：“夫馀国，在玄菟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婁，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其地大致范围是：东至张广才岭、威虎岭，西至今吉林省的双辽、长岭一线，北至第一松花江西段，南至燕汉长城及辉发河一线。考古界所说的“西团山文化”即是夫馀先人秽人的文化，二者在地域上基本是一致的。

【东夷】此指高句丽。

【别种】另外的一支。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的建国者朱蒙是夫馀王族的成员。

原文

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



注释

【五族】即五部，指五个部落或五个行政区。《后汉书》李贤注：“案今高句骊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

【相加】是由国王直接任命的官职，应是高句丽贵族议会机构“诸加评议会”的最高长官。“相”是汉语词素，“加”是夫余、高句丽语词素的音译形式，二者合起来构成合成词，意谓“相一级的长官”。夫余有“马加、狗加”等官。

【对卢】这一官称为高句丽所独有，相当于国相，为百官之长，但此官不是由国王所任命的，而是由争作此官者凭武力较量后，胜者为之，足见高句丽官制中尚且保留着原始社会中的某些因素。

【沛者】爵位名，中央“沛者”的地位与“对卢”相仿佛，往往是对高官的一种加爵。从《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看，地方亦有这一爵位。

【古邹大加】亦作“古邹加”，《三国志》云有三种人可荣获这一封爵，而《三国史记》尚载有被俘之朱那王子乙音封为“古邹加”的例子，说明还有第四种人可以加“古维加”之号。

【主簿】此称号中原王朝仅作为官职的名称，皆为典领文书事务之职，而高句丽人借而作为爵称。是国王的亲信，常常负责出兵打仗及相关外交事务。

【优台】《三国史记》作“于台”，二者为同音异写，为爵称，亦有中央、地方两级，亦常用作某高官的“加爵”。

【使者】借用中原“使者”之称，但官位固定。

【帛衣】亦作“皂衣”，高句丽中央以及各部（地方）皆设有此官。《三国志·吴主传》裴注中载有位官遣二十五名皂衣送秦旦回吴之事，这二十五名皂衣显然是隶属王家，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另外，

《三国史记》所载明临答夫曾任“掾那皂衣”，阳神曾任“沸流部皂衣”，此乃“地方级”官员。

【先人】《高丽纪》云：“次先人，比正九品，一名失之，一名庶人。”《周书》、《北史》皆作“仙人”。《泉男生墓志铭》有“年始九岁即授先人”的记载，《三国史记》有“黜大臣仇都、逸苟、焚求等三人为先人”的记载，足见此官地位之不高。

原文

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喜，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禰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人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注释

【武帝灭朝鲜】指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遣军攻打卫氏朝鲜事。卫氏朝鲜于元封三年灭亡。卫氏朝鲜是公元前195年，由我国燕人卫满所建立的，共有三代王，右渠即卫满之孙。详见《史记·朝鲜列传》、《魏略辑本》。

【以高句丽为县】高句丽县是第二玄菟郡首府所在地，是以高句丽族名命名的。其故址，旧说在清代兴京（今新宾县）老城附近；近年来，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西南苏子河南岸发现了两座汉代城址，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其中的一座城当是汉代的高句丽县城。（见徐家国《汉玄菟郡二迁址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3期；《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考古》1989年11期。）《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